



### 个人简况

施向东，1948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天津大学中文系和国际文化教育中心教授。致力于汉语音韵学、汉藏语言比较、梵汉对音、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是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员、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华北地区分会理事、天津语言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上古介音\*-r-与来纽》（《音韵学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4年）、《试论上古音幽宵两部与侵谈缉盍四部的通转》（《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

# 汉语和藏语 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

施向东 著

华语教学出版社  
北京

# 目 录

序 .....	刘广和
第一篇 绪论 .....	1
一、关于汉语和藏语比较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	1
二、汉藏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 .....	7
第二篇 汉-藏同源词谱 .....	23
第三篇 分论 .....	146
关于前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和 构词类型问题 .....	146
上古汉语声母 *s- 与 *x- 的交替 .....	153
上古介音 *-r- 与来纽 .....	172
中古汉语合口介音的一个来源 .....	191
汉藏语前缀对上古汉语声母和介音的 影响 .....	204
试论上古音幽宵两部与侵缉谈盍四部的 通转 .....	212
《同源字典》衍义 .....	230
汉藏同源词比较:汉语训诂学的新路子 .....	244
古代汉语的中指代词 .....	254
词语索引 .....	262
后记 .....	293

# 序

刘广和

十八世纪末,语言学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突破,那就是英国的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的“印欧语假说”。他假定,梵语跟欧洲的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有系统的相似性,是因为它们来源于同一个原始母语。后来,丹麦的拉斯克(Rasmus Rask)发现北欧日尔曼系语言跟希腊语、拉丁语的语音对应关系;1822年德国格林(Jacob Grimm)发现日尔曼辅音大转移的规则;格林定律的三组例外,陆续由罗德纳(C. Lottner)、格拉斯曼(H. Grassmann)、维尔纳(K. Verner)做出了解释。到1876年维尔纳定律诞生,对原始印欧母语到原始日尔曼语的音变条件,已经提出了全面的解释,历史比较法站稳了脚跟。十九世纪是历史比较法大红大紫的时代。

欧洲人做的比较研究是相当可靠的。比如对数词的分析:

	法语	意语	西语	拉丁语
一	un, une	uno, una	uno, una	ūnus, ūna, ūnum
二	deus	due	due	duo
三	trois	tre	tres	trēs
.....				
八	huit	otto	ocho	octō
.....				

一二三的词形,谁都看得出来,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

有语音对应关系。法语的八有点儿怪,别人是元音 o 的,它是 ui。可是能找到一批例子证明,这个怪现象也是有规律的,比如:

	法语	意语	西语	拉丁语
夜	nuit	notte	noche	nocte
煮	cuit	cotto		cōquo

法语正是以 ui 对应别人的 o。语言学家假定,法、意、西三种语言的对应不是偶然的,它们有共同的来源。当然,现在咱们知道,它们都是拉丁语派生的,用不着我再多说什么了。

欧洲语言学家确定原始母语喜欢用形态,梅耶说,能作为确定“共同语”和后代语之间连续性的证据的,只有那些表现形态的特殊规则。比方说,给名词、形容词规定出阳性、阴性,其实这些区别往往是没有意义的。举个例子说,俄语管身体叫 тело 算中性的,还说的过去,可是脑袋叫 голова,不论男人的女人的,一律算阴性,邪门儿不邪门儿?可是梵语、拉丁语、法语等都有这种语法范畴。正是这批没有意义的语法范畴、例外的形式,对证明亲属关系和拟测原始母语特别有用。

欧洲人发明的这套方法是从研究印欧语言的实践中得出来的。印欧语形态繁复,比方说梵语,它的名词有性、数、格儿,性又分阳性、阴性、中性,数又分单数、双数、复数,格儿又分成八个:体格、业格、具格、与格、离格、属格、于格、呼格,一大堆。“马”这个词是阳性的,光写出它的单数变格儿就有八个: aśvas、aśvam、aśven、aśvāya、aśvan、aśvasya、aśve、aśva;还有双数的、复数的变格儿呢。动词有人称、数、语态、时态等,各范畴也有一批下位的小类,又是一大堆。丰富的形态成了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镐下的富矿。

印欧语发生学的关系建立之后,学者们照葫芦画瓢,根据地域和类型什么的,提出汉藏语系的假设。可是算成汉藏语的那些语言比起印欧语来就缺乏形态特点了,汉语没有变格儿、变位;藏语

传统语法讲八转声,那是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为了教人能翻译梵文,照着梵文名词的八个格儿,拿自己的五六套结构助词编出来个八转声,并不是本身实际有变格儿。学者们对汉藏语包括的很多语言本身和语言之间对应关系描写和研究还不够。再往远处看,我们对上古时期汉族跟其他民族文化、语言上的接触产生的结果了解的也不够。面对着这么多难题,研究汉藏语系比研究印欧语系可就艰苦多了。怪不得从李方桂先生 1937 年发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到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连汉藏语系应该包括哪些语言这个问题都还在争论不休。李先生和国内一些学者主张汉藏语系也包括侗台、苗瑶两个语族,白保罗(P. K. Benedict)先生跟国外一些学者主张把侗台、苗瑶两个语族划归南岛语系。

困难孕育着机遇。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学者逐渐深入研究本土各族语言、各语言之间的关系,发明新的研究方法,提出系属划分的新设想,不断推动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也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里头,值得赞扬的人可就多了,因为本文话题的局限,下头仅就俞敏、邢公畹先生说几句话。中国早期做汉藏语研究的学者里头就有俞敏师,四十年代他就开始系统的比较汉藏语的实词和虚词,八十年代末求出毛六百对儿汉藏同源词,完成了洋洋大观的《汉藏同源字谱稿》,为证明汉语和藏语的发生学关系立下汗马功劳。邢先生是研究侗台语的“元勋”,他认为欧洲注重形态的比较法不适合研究汉藏语系,就提出了同源体系比较、语义学比较理论,邢先生为探索同源关系打开了一条新通道。假定看过俞先生和邢先生的文章,再看这本儿《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就好懂了。

这本儿书里头的第二编“汉藏同源词谱”算得上汉语跟藏语同源字研究的“鸿篇巨制”。词谱分四类排列同源字,除了第四类大体上是一为一组,其他三类每一组里都不是只有一个藏文对一个汉字,比方说,第一类为“一词多义者”,

1.1.01 藏文 vbras 1) 米饭。 汉字 粝。

2) 疮疖, 瘰疬。汉字 疖。

1.2.01 汉字 播 1) 迁也。藏文 spar, spard……

2) 弃也。藏文 vbord, bor。

我粗粗一算, 四类大概齐有四百五十五组左右, 抛了第四类三十六组, 平均有两对儿到三对儿同源字的差不多有四百二十组, 换句话说, 他假定的汉藏同源字在一千对儿以上! 据我所知, 在国内学者当中眼下还没有谁超过他。更值得一提的是, 把邢先生的方法用到汉语跟藏语的比较上, 并且能发现同源体系的一致性有更多的表现形式, 在国内学者当中他是第一人。

我并不是说, 他假定的一千多对儿汉藏同源字完美无缺, “南山可移, 此案不可翻”。或许以后他自己也会修改、完善其中的一些东西, 这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常规。

这一二十年来向东兄大部分时间教公共基础课, 任务又重, 经常是专业干业余, 业余干专业, 可是他居然源源不断的发表了不少有创见的文章, 如今又继承俞敏师的事业完成了这部力作! 除了他的勤苦之外, 不能不赞叹他的智慧, 向东称得上“世之才士也”。论起来, 好象不该由我说这句话, 可是又有这么一说, “举贤不避亲”。既然不违古训, 自然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1999年10月

## 主要参考文献

梅 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 1957, 科学出版社。

邢公畹《汉语遇蟹止效流五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 语言研究, 1983年1期。

## 第一篇 绪 论

### 一、关于汉语和藏语 比较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对不同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所比较的语言应当在发生学上具有亲属关系。18—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其实就是对印欧系诸语言例如梵语、拉丁语、希腊语、日尔曼语等的历史比较研究。这些语言在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已经得到充分的论证并已得到普遍的认可。有的学者甚至已经为它们构拟了共同的母语——原始印欧语。对于汉语和藏语的比较研究(实质上也是历史比较研究)来说,这也是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汉语和藏语是否具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中国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都持肯定的态度。李方桂(1937,1973)最早提出了汉藏语系的分类法,提出汉藏语系包括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罗常培、傅懋勳(1954)提出的汉藏语系分类表与李方桂的分类法也大致相同。王静如(1931)、俞敏(1949、1957、1980、1981、1987、1989、1991等)、邢公畹(1984、1991)等学者也提出了支持汉藏同源的理由和证据。国外学者西门(1929)、谢飞(1955)、白保罗(1972)、包拟古(1969、1973、1980)等人,也认为汉藏同源。但是,怀疑这种关系的也大有人在。直至七十年代初,在国际汉藏语学会上,“有的人还完全不相信汉语与藏缅语言的发生学关系。”(马提索夫1973)张琨对此也犹豫不定:“尽管有

许多学者的艰苦努力,但藏缅语言和汉语的发生学关系还有待建立。”(张琨 1973)因此,证明汉藏同源,是进行汉语和藏语比较研究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关于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常常先假设存在一个语系,然后去证明它。通常的做法是把这些语言共有的基本词汇进行比较,以构拟这些语言的母语,寻求它们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正是这样做的。汉语和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如西门、王静如、白保罗、龚煌城(1980)、柯蔚南(1986)等人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种做法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正如俞敏指出的:“我们一上来说汉话 X 和藏话 Y 音、义都近,证明汉、藏两种话是从一个来源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汉藏话是亲属语言。反过来我们又用汉藏同源理论证明汉话 P 和藏话 Q(好比‘鱼’,北京人说[y],藏话说[ña])音不近是后来演变的,原来应该一样。这真够引起人冷嘲热讽的。”(俞敏 1980)桥本万太郎也说:“从两个语言间发现音韵对应,来建立‘音韵法则’,再用这个‘音韵法则’来证明谱系关系——这样,比较语言学的看法就成了问题。”(桥本万太郎 1977)

为了跳出这种循环,许多中国学者作了多方面艰苦的探索和研究。俞敏在《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中,从历史学、文献学的角度,用严密的方法和确凿的史料,详细论证了汉藏两族人和话有同一个起源。在《汉藏同源字谱稿》中又扼要地叙述了这一观点:“古史料反映的远古史记载汉藏两个民族是一个氏族分裂成的。《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旧唐书·吐蕃传》说:‘吐蕃……本汉西羌……樊尼乃率众西奔……于羌中建国……’姬是周王室的姓,姜是部分‘中国’(黄河中下游)诸侯和吐蕃的姓。汉藏同源有史料证明。”(俞敏 1980,1989)邢公畹在《汉藏语概论·汉语篇》“汉族和其

他汉藏系语族人民的史前关系”一章中,将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的最新成果引进汉藏系语言史的研究,指出:“西藏自治区跟祖国其他地区一样,有新石器文化分布,而且跟中原地区有不可分割的文化联系。……有一个与后世藏族有关的古种族在远古从华北平原向西南逐步迁徙,沿甘肃、青海、四川而入西藏,还有一部分顺川康之间的横断山脉而入云南。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发展成为藏缅语族……这个古种族就可以称为‘原始羌·华夏族’。”(邢公畹 1991)这些研究结论使汉藏语言的比较研究完全建立在了坚实的基础之上。

桥本万太郎对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东亚语言提出了挑战。(桥本 1977)按照他的“语言地理类型学”的观点,语言可以分为“牧畜民型语言”和“农耕民型语言”两类。汉族当然是典型的农耕民族,那么汉语就是农耕民型语言了。藏族是典型的牧畜民族,藏语当然就是牧畜民型语言了。依了桥本,汉藏两族语言同源的理论就不能成立。汉语和藏语中一些词音义对应只不过是“词汇推移”的结果。但是桥本的理论无法推翻关于汉藏同源的一系列历史的、文献的、考古的和人类学的证据,也无法推翻汉藏语言之间存在大量同源词的事实。桥本从地缘接触和词汇推移的角度举了“江、河”两个字的例子,认为“江”是长江以南河流的通称,“河”是长江以北对河流的通称,而这两个字恰好可以跟古藏语的 klung 和蒙古语的 xool 联系起来。古藏语 klung,梅祖麟、罗杰瑞认为借自孟高棉语系,而桥本将他直接跟上古汉语的江 \*krong 联系起来(见桥本 1977)。在我们看来,这个例子证明不了“词汇推移”的理论。如上文所述,藏族就其渊源来说始终是同西北、华北一带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相联系的,尽管他们居住的地方从纬度上说跟两湖、江浙相当。藏族与汉族的交往,从吐蕃时代的金石、简牍等文献看,其主要途径也在西北一带。如果说词汇“推移”,那么“推移”

到藏语中去的恰恰应当是“河”字而不是“江”字。古藏语 *rgal*<sup>①</sup>“浅滩”，*rgal-ba*“过河”，可与汉语“河” \* *gal* 比较，但这与“推移”无关，因为与此有关还有一族词呈现出整齐的对应：汉语“何” \* *gal* 藏语 *gal(a)*“为什么、怎么、哪里”；汉语何荷 \* *gal* 藏语 *sgal*“驮子、背的东西”；汉语“呵” \* *gal*, \* *hal* 藏语 *glal*“呵欠”，除了承认它们同源以外，再也无法解释它们何以会“巧合”到如此地步。

在汉语和藏语的比较研究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诘问：藏文创始于公元7世纪，这正好相当于中原的唐朝。从汉语方面说，这时候已处于中古时期，上古汉语的许多特征已经消失。但是，人们却总是将书面藏文同汉语上古音联系起来进行比较。汉语上古音通常是以诗经音为代表的，这两者在年代上相差一千二、三百年，这种比较可信吗？诚然，如果我们能获得更早的藏语材料，那是最理想的。但是藏文文献中最古的吐蕃文献——金石碑刻、木简木牍、纸卷皮卷等等——不早于7世纪。通过藏语诸方言和藏缅语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或许可以发掘出上古藏语某些更古老的特征，以弥补目前的不足。但是如果以为书面藏文只能同中古汉语进行比较，那就大错特错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从同一语言分化出来的各个语言离开原始母语的语源中心越远，它受语源中心的变化影响就越小，因而可以在这种语言中找到同源诸语言中最古老的语言特征。因此，历史比较语言学允许比较那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相隔较远的语言。”（梅耶 1925）按照这一理论，僻在西土的藏族，他们的语言保存着比同时期的汉语多得多的古老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邢公畹先生在谈到汉语各方言时指出：“从现代汉语方

① 为排印方便起见，本书所用藏文转写符号系仿照王尧《吐蕃金石录》的转写系统，按藏文30字母和元音的习惯顺序排列如下：*k kh g ng c ch j ny t th d n p ph b m ts tsh dz w zh z v y r l sh s h a i u e o*，并且 *g·yag* 与 *gyag* 不同。

言地理铺陈的序列上看,迁得越远的,就越能保持语言的较古的或更古的形式。”(邢公畹 1991)这个道理,与一个语系中各个语言或语族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汉语经过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时间,在民族的动荡、冲突、分化、融合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失去了很多古老的形态,因此用隋唐时代的中古汉语去同藏文进行比较,恰恰会迷失了正确的方向。将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同上古汉语进行比较,不但是可以的,而且应当说是必须如此的。藏文反映出古藏语保存着音节开头和音节末尾的辅音丛,这种形态就比较古老,中古汉语中绝无此种现象。它给上古汉语的研究以很多启发。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应当承认复辅音在上古汉语中的存在。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研究特别强调形态。梅耶说过:“一种形态繁杂的语言,包含着很多的特殊事实,它的亲属关系自然比较容易得到证明;反过来,一种形态简单的语言,只有一些一般的规则,如词的次序,要找出有力的证据就不容易了。”他甚至断言:“想根据汉语、西藏语等后代语言构拟出一种‘共同语’,是要遇到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阻力的。”(梅耶 1925)不赞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东亚语言的桥本万太郎也援引梅耶来证明他的观点。(桥本 1977)这就涉及历史比较方法是否适合于研究汉藏语言的问题。

形态变化方面的特殊事实固然是发现语音对应规则的便利条件,但并不是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唯一的必要条件。“形态变化的相似性确实是历史比较的一根有用的拐杖。但是,这并不是说,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间的历史比较就无所凭借。这些语言虽然词根较短,增加了历史比较的困难,但语音对应规律这个客观根据并没有丧失。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设法排除词根相符的偶然性或借用的可能,以发现可靠的对应规律,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徐通锵、王洪君 1988)梅耶本人也曾强调要从“形态、语音、词汇”这“三个不同的系统”来比较各种亲属语言。(梅耶 1925)马学良指出:“历史

比较的方法,最基本的工作是利用亲属语言中的对应关系找出同源字”。(马学良 1991)邢公畹先生近年提出了确认汉藏同源词的“语义学比较法”：“这种方法是先求出汉语一个字(当然是属于基本词语的)的上古音,然后查找在台语以及藏缅语里有没有可以和他相对应的字;如果有,我们再看汉语的这个字有哪些同音不同义的字,然后查找这些同音不同义的字在台语以及藏缅语里是不是也都能对应;如果也能对应,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组多层对应的字群。在这个字群里,汉、台以及藏缅语的这些能对应的字之间是发生学关系,不是借贷关系。”(邢公畹 1994)这一理论打开了汉藏研究的崭新的思路,指明了寻找汉藏同源词的简明有效的方法。多年来,汉藏语言比较研究者们孜孜不倦地发掘、确认同源字,以此建立语音对应规则,藉此重构原始形态,以指导汉藏语系各个语言的历史研究。王静如 1931 年就比较了汉语、台语、藏缅语的数词和人称代词(王静如 1931),俞敏从四十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汉藏比较研究,在汉藏同源字研究方面作出了可观的成绩(俞敏 1949、1957、1987、1989、1992 等),海外和台湾学者的有关著述也贡献了很多汉藏同源字的例证,如白保罗(1972、1976)、包拟古(1969、1973、1980、1985)、龚焯城(1980)、柯蔚南(1986)等。白保罗虽然认为汉语与藏缅语“这两个语族只有很少同源词”,但“相信这两个语族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因为“两者有共同的基本词根,并可为这些词根建立共同的语音规律。”(白保罗 1972) 龚焯城用 182 组同源字比较了汉、藏、缅三种语言的元音,为汉藏母语构拟了 4 个元音 a、i、u、ə,并建立了从汉藏母语到汉、藏、缅语音变化的规则。(龚焯城 1980)柯蔚南比较了五百多组汉藏同源词,分别为它们构拟了原始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构拟了原始汉藏语的声母、介音、元音、韵尾和声调的系统。(柯蔚南 1986) 俞敏按汉语上古音 32 韵部与藏语进行比较,共列出 565 组同源字,发现并指出上古汉语 32 韵部中 29 个韵部与藏语之间存在有规则的语音对应关系。

(俞敏 1989)汉藏比较研究的实际进程已经给了怀疑论者以有力的肯定的回答。

## 二、汉藏同源体系的 比较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

张琨曾批评汉藏比较说：“偶尔有一两个词，比方说‘飞’和藏语的 phur-ba 很相近，可是深究一步，《切韵》里微部的字跟藏语的 -ur 有多少对应的呢？很难说。”（见徐通锵 1991, 65 页引）在亲属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偶然性确实是一个大敌。为了避免比较研究中的偶然性和任意性，我们引进“同源体系”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邢公畹先生在《汉语遇、蟹、止、效、流五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邢公畹 1983）一文中首先采用的。同源体系这一概念的采用使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有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 1、同源体系一致性的表现形式

邢公畹先生的上述文章指出：“一些字在意义上，或者在语音上（包括古文字的谐声关系上）相关联，我们就说它们有‘同源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有同源关系的字，构成一个‘同源体系’”。“同源体系的一致性有两种情况：1) 汉语有 AB 两个字同义，构成一个同源体系，但是不同音，侗台语里也有同义不同音的甲乙两个字跟汉语对应。……2) 汉语有 ABC 三个字都同音，但是不同义，构成一个同源体系，在侗台语里也有同音或音近而不同义的两个，甚至三个字跟汉语相对应。”（邢公畹 1983）后来，邢公畹又提出“深层对应”的理论：“如果汉台两语中各有一群意义不相同的‘同音字’，都能在意义和音韵形式上互相对应，我们就管它叫‘深层对应’（或‘多层对应’）。……查寻‘深层对应’体系的方法可以称为‘语义学比较法’（Semantical comparative method）。”（邢公畹 1997）很明显，“深层对应”体系也就是上述同源体系的第三种情

况。在汉语和藏语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同源体系的一致性有更多的表现形式。

第一,在汉语中,同一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在藏语中也有一个相应的词或一组声音相关的词具有这几个意思。如

味《说文》:“味,鸟口也。”《诗·曹风·候人》传:“味,喙也。”《左传襄公九年》:“味为鹑火。”孔疏:“味,谓柳也。”按鹑火和柳皆星宿名。藏文 mchu,据才旦夏茸《藏汉词汇》义为:1)唇,鸟喙;2)长度;3)星名。其中1)3)两义与味字的两义密合。而其第二义“长度”可与汉字“铢”(重量单位)相比较。

播《后汉书·献帝纪》李注:“播,迁也。”《楚辞·思古》王注:“播,弃也。”藏文 spar, spor 迁移,搬,徙。bor 丢弃,抛弃,遗失;yal-bor 抛弃,背离。

第二,在汉语中,一个字的本义和它的引申义与藏语中一个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相对应。如

裁《广雅释言》:“裁,制也。”《广雅释诂二》:“裁,裂也。”这是它的本义,割断、截断的意思,而《谷梁序》陆德明释文:“裁谓善能裁断。”这是判断、决断的意思,是引申义。藏文 chod, chod-pa 也正好既有切、截、割断的意思,又有决定、决断、判决的意思。

第三,在汉语中,几个不同的字有同一意思,它们与藏语中具有同一意思的一组字在语音上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如

屠《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李注:“多所诛杀曰屠。”杀《说文》:“杀,戮也。”戡《尔雅释诂》:“戡,克也”(《尚书·牧誓》注:“克,杀也”)。藏文 dag-zin, gdag-bya 杀,死。gsad, bsad 杀。kum-pa, gum 杀,杀戮。

举《说文》:“举,对举也。”擎《广雅释诂一》:“擎,举也。”提《汉书·刑法志》集注:“提,举也。”藏文 bkjag 举,扛,抬。sgreng 举起。gdeg 举,提。

第四,在汉语中,几个同音或音近或从同一谐声符得声的字,与藏语中一组语音形式相关的词有一一对应的意义。如

同《说文》:“同,合会也。”筒《说文》:“筒,竹管也。”洞《文选·西京赋》薛注:“洞,穴深且通也。”藏文 sdong 同行,伴行,结伴。dong-ba 箭筒。dong 地洞,地坑。

桴《左传成公二年》释文:“桴,鼓槌也。”郭《说文》:“郭,郭也。”缶《尔雅释器》:“盎谓之缶。”《汉书·杨恽传》注:“缶即今之盆类也。”胞《说文》:“胞,儿生裹也。”堡,保《礼记·月令》注:“小城曰保。”藏文 dbyu-gu 鼓槌,小棍。phru-ma 军营,胎衣。phru-rdog 盆,器皿。

第五,在汉语中,从同一个语根孳乳产生的一组字与藏语中具有相应词义的一组词在语音形式上一一对应。如

胡乾耆《诗·周颂·载芟》传:“胡,寿也。”藏文 rga 老。《方言》十:“乾,老也。”藏文 rgan-po 老者,老男;rgan-rgon 老夫妇,翁姬。《说文》:“耆,老也。”藏文 bgres-pa 老者,长者(敬语)。

此外,藏语中一些古语、敬语、联绵词等等,也和汉语中的一些字音义相关,这些都是我们应予重视的。

## 2、同源体系比较的方法论的意义

如上所述,半个多世纪以来,汉藏语言的比较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对汉语和藏语的历史面貌和历史渊源的认识较以前更加深入了。但是应当承认,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汉藏语的比较研究相对来说还属初级阶段,两组语言的语音对应规则,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确实可靠的同源词,还不能加以总的、全面的叙述。现在的任务,必须发现更多的有联系的词汇,而这个工作无论汉语还是藏缅语,两方面都存在一定困难,要深入进行比较研究,这些困难必须要加以克服。”(罗杰瑞 1995, 12-13) 将同源体系的比较引进汉语和藏语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克服这些困难。

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偶然性和任意性,有效地发现和确认一大批同源词。

同族语言间的语音对应规则靠同源词的比较发现和建立,而同源词的选取和确定必须避免任意性和偶然性。几乎在任何两种语言之间都可以找到个别的字词在声音和意义上相同或相似。比如英文 pan“盘子”, ken“看见”, nip“夹,钳,捏”, dab“比目鱼”,跟汉语里的“盘、看、镊、鰈”(《说文》:“鰈,比目鱼也”)在音义上确实近似,藏文 mnog“很多,茂盛”与斯拉夫语词根 mnog“多”也差似。但是谁也不能说汉语和英语同源,藏语和斯拉夫语同源,因为个别字词的相似是偶然的。即使在同族语言中,在选取和确定同源词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偶然性和任意性的陷阱。就拿汉语和藏语来说,藏文 hung-thag“皇割”, hung-la“黄蜡”,藏汉之间确实相似,我们似乎可以据此得出结论说,汉语的 huang(黄皇)和藏语的 hung 之间存在着有规则的对应。其实大谬不然。这两个藏文词都是近代借自汉语的借词,根本不能当做同源词来处理。两个毫无亲属关系的语言中个别词的相似,跟亲属语言中同源词的音义相关,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亲属语言中借词(尤其是晚近的借词)跟同源词性质也是不同的。当它们作为个例存在时,有时很难区别。但是一旦把它们放在系统中,它们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说英文 dab 跟汉语“鰈”只是偶然相似,因为我们再也找不到跟 dab 同根或同音或音近的英文词,跟汉语“鰈”的同族词或同音词有音义的联系。而在汉语和藏语中,情况就不同了。“鰈”字从鱼茱声,凡从茱声的字,多有扁平义,比目鱼形体扁平,故作“鰈”。藏文 leb-mo, leb-leb 扁,扁平。《说文》:“茱,扁也,茱,薄也。”不但如此,汉语里凡从茱声的字,多与 leb 有音义关系。藏: leb-shing 木板;汉:牒,《广雅释器》:“牒,版也。”藏: phje-ma-leb 蝴蝶;汉:蝶。藏: deb 册子,本子,记录,青史;汉:牒,《说文》:“牒,札也。”《史记·三代世表》索隐:“牒者记系谥之书也。”藏: ldebs 壁,墙。汉:堞,《左传·